

## 汪暉與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汪暉的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是一個我們要重新思考中文語境之現代性問題時，無法越過的一個地標。他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挑戰我們回應的問題：從孫文到毛澤東所建立的龐大而穩定的中國民族認同，從革命到建國，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為什麼此進程成功地將「帝國遺產」轉化為革命與建設的要素？為什麼這個地國體制沒有瓦解而轉型成為新的主權？是否可能從19世紀壟罩各地的民族－國家敘事之下的帝國概念，也就是帝國所包含的普遍性與多元性的辯證關係，重新發現「後民族－國家」的政治型態的因素？（第一卷第一部，頁22-23）

汪暉的問題自然並不僅停留在「中國」的地理政治之內，而同時也以各種不同的面向牽連了台灣——從晚清維新到辛亥革命，從梁啟超的新民到五四運動，從民國到南京政府、清黨、內戰到台灣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或是到台海關係與中共的反分裂法，都以十分內部的靠近性迫使台灣重新思考有關身分認同的問題，或是所謂自我同一性的問題，或是主權的問題，或是非同一與非主權的問題，或是重新定一所謂的主體與主權的概念。

晚清的維新運動，也不是一個獨立事件。晚清知識份子在甲午戰敗割讓台灣之後，面對「天下大局破裂」，而感「割心沈痛」，急切地想要追上日本自1867年啟動的明治維新運動，除了透過傳教士的翻譯之外，同時也大量派遣學生留日，翻譯介紹日譯西方知識。這個知識結構的轉變，被納入了中國的教育體制與知識版圖，牽動了二十世紀中國場域內的主體結構。

十九世紀的知識流通，同時被台灣的仕紳知識份子所接收。教會新報、圖畫新報是一例。出版物的流通更是一例。日治時期延續日本國家主義之下的教育制度，更強化了此明治維新以來的知識型結構。

台灣二十世紀以來所面對的現代性問題，銜接了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以及相對發生的政治關係與知識結構內化中，觸發了不同的主體位置與情感結構。

如果我們要延續汪暉的問題，我們除了要問為什麼這種民族認同持續以自我同一性的方式鞏固自身、複製自身之外，還要問是什麼型態的恐懼，使得此堅硬的主體不敢思考解體？除了馬克思主義、費正清與韋伯等學者「挑戰—回應」的歷史敘事，或是內藤湖南、京都學派與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除了回溯檢視明清資本主義或是先秦政治理性等現代性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思考的取徑？汪暉如何思考亞洲自身的歷史？汪暉試圖打破帝國—國家的二元性思考，要在帝國的多元？他如何透過知識—制度—道德此三軸的動力拓樸概念，或是民間—官方—情感、文學、信仰的三軸關係，檢討程朱理學的二元論？天理如何讓位於公理？什麼是「儒學內部的潛力」？他如何檢討歷史斷裂之後的主體出現？對於歷史過程的問題，人口/需求—生產—消費/生產過剩—擴張市場—武力征服/殖民，汪暉如何回應？如何思考晚清儒者再面對世局變化之時，納入西方知識體系的同時，保其了對於資本主義以及其政治形式的批判性距離？這些晚清儒者真的佔據了這個批判性的位置嗎？

汪暉：〈導論〉，《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102.

延伸閱讀：

1. 汪暉：〈天理與時勢〉，〈物的轉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05-344。